

新视角下的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侯冠平 芦江涛 〇著

新视角下的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侯冠平 芦江涛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做了初步的探讨;第二章介绍了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第三章主要说明知识化必须贯穿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第四章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实证分析;第五章主要说明怎样用知识化推动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解决“三农”问题;第六章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对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简单展望。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视角下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侯冠平,芦江涛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 - 7 - 5640 - 7984 - 0

I. ①新… II. ①侯…②芦… III. ①二元经济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238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1.75

字 数 / 217千字

版 次 /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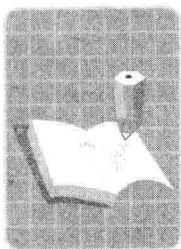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王俊洁

文案编辑 / 王俊洁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吴皓云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我国日益凸显的重要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核心是收入差距问题。城市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从逻辑上来说，城乡收入差距自从城市产生开始就已经存在。因为城市的产生是有一定条件的，这些条件可以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优越、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等。便利的交通或者说交通枢纽，容易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易，聚集在这些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富裕起来；肥沃的土地使得人们产出较多，就会产生交换的需求，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中有一部分慢慢脱离农业生产而变成商人。这些条件也可以是政治军事目的地，如军事要塞也常常容易发展成为城市，国家常常会在这些要塞投入大量的资财，也会使得这里的居民容易富裕起来。就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言，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具有自身的特点：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我国城乡分离成“互不往来”的两个社会；对农业农民过多地索取，使得农民不堪重负。经营农业效益比较低，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能否较好地解决，关系到我国能否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关系到我国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整个社会福祉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为此，我们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本书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全面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认为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本书还运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劳动价值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地位和决定的转换等基本理论和原理[生产力是由五个要素决定的,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与社会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见《资本论》第I卷第53页),在不同时期,决定生产力的这五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

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观察法、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法、系统科学方法等,涉及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旅游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门科学。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问题提出的原因、时代背景和主要理论依据,介绍了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状况以及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对这些观点做了简单的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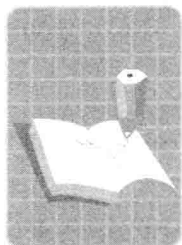
正文部分共七章,第一章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做了初步的探讨,介绍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的主要表现、形成过程和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的影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意义。第二章介绍了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道路不符合我国国情,说明我国必须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三章主要说明知识化必须贯穿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认为在我国,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及其地位和作用相互转换的原理,客观上要求要用知识化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用知识化推进“二元结构”一元化具有必然性,提出了城乡素质“二元结构”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简单分析,说明素质“二元结构”问题是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的主要因素。第四章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实证分析,主要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出规律,并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该章中的每个小节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参考文献也是相对独立地列出。第五章主要说明怎样用知识化推动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解决“三农”问题,认为消除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是消除经济“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用知识化带动城镇化、加速知识型小城镇建设,要用知识化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推进知识化进程、变人口压力为人口优势,要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培养村级优秀骨干,要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多种形式联合企业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实现教育创新,并把政府的有效扶持与农民的积极自救相结合。

第六章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对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提出发展休闲农业，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让三沙海洋体验为海南旅游注入活力，用渐进式稳健开发蓝色海洋体验式旅游的策略，带动海南新一轮旅游业发展等观点。该章中的每个小节也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参考文献也是相对独立地列出。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对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简单展望。

本书著述分工：引言、第一章和第四章由侯冠平著；第五章至第七章由芦江涛著。侯冠平所著字数大约为 11.7 万字，芦江涛所著字数为 10 万字。

另外，为了逻辑的严密性，在计量分析的章节里，具有独立完整的内容体系。

当然，由于作者的水平、时间、精力的限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因此，还有很多没有涉及的领域。另外，在进行计量分析时，没有考虑各省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此，也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竭尽所能，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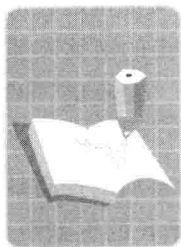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引 言	(1)
1. 问题提出的原因	(1)
2. 问题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	(5)
3. 对中外“二元结构”理论一些观点的述评	(5)
4. 研究思路和方法	(10)
5. 本书的结构	(11)
6. 本书的不足之处	(12)
第一章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初探	(14)
1. 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	(14)
2.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19)
3. 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的影响	(21)
4.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意义	(23)
第二章 工业化带动农业化道路与我国实际	(25)
1. 英国的发展道路——从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到农业现代化	(25)
2.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的实质	(29)
3. 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道路不符合我国国情	(29)
第三章 知识化必须贯穿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	(32)
1. 用知识化推进“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必然性	(32)
2. 用知识化推进“二元结构”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33)



3. 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模型	(35)
第四章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实证分析	(39)
1. 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VAR 模型的动态分析	(39)
2. 产业发展、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VAR 模型的动态分析	(48)
3. 基于 VAR 模型的产业发展、物价上涨与城乡收入差距	(62)
4. 基于 VAR 模型的第三产业发展 人口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82)
第五章 用知识化带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95)
1.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消除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	(95)
2. 用知识化带动城镇化，加速知识型小城镇建设	(98)
3. 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101)
4. 推进知识化进程，变人口压力为人口优势	(103)
5. 提高农村干部素质	(105)
6. 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	(107)
7.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109)
8.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现教育创新	(111)
9. 政府有效扶持与农民积极自救相结合	(116)
第六章 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实证分析	(120)
1. 海南经济、旅游业、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120)
2. 海南经济、旅游业、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133)
3. 经济增长 经济差距与粤琼经济合作 ——基于粤琼经济发展的联立方程模型	(146)
4. 发展休闲农业，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155)
5. 构建海南农村物流体系，推进二元经济一元化	(160)
6. 让蓝色海洋体验式旅游为海南经济再添生机	(170)
第七章 结 论	(176)
附 录	(177)



引言

1

问题提出的原因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并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26.1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我国的人口规模已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12年的13.7亿，虽然印度人口有迎头赶上的趋势，但我国一直是“遥遥领先”。与此同时，城乡差距也逐渐扩大，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差209.8元，1980年达到264.8元，1983年这一指标降为188.6元，达到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最低点，以后这一指标稳步增长，到2010年达到3246.5元，是1978年的15.5倍、1983年的17.2倍。经济增长使得人们福利增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和健康水平，使得婴儿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增加，从而使得人口增加；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化，是由于经济增长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并不平衡引起的，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经济增长，并一度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城市经济也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在城市经济也进行改革的时候就失去了比较优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实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不同，使得城乡人口增长率存在一定差距，这种人口增长率的差距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教育发展、人口增长、城镇化等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成为摆在政府与经济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了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学者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政府部门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而言,在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上,我们所走的道路实质上几乎仍然是数百年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道路,是一种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城市化道路。

可是,当今世界早已跨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要占60%~80%,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则要占10%~30%,资本投入的增长仅占10%)。如果我们仍然走别人走过的路——紧抱着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解决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的思路,就难以给我国经济注入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解决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应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态势的要求,绝不能照抄照搬几百年前别人用过的方法,必须用能够适应知识经济发展态势要求的新思维、新道路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要用知识化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

知识化就是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力提高我国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大力提高各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过程。知识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知识化是一个全民族整体素质尤其是全民族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知识化的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赋予崭新的内容。

什么是“二元结构”?在各种资料中,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准确、完整的关于“二元结构”概念的定义。在这里,我想把“二元结构”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样一种不协调:由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从而引起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并进一步引起一种城乡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隔绝甚至产生断层的情况,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城乡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从概念的起源来说,“二元结构”这一概念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 H. Boeke)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二元性是一种引入的社会制度与另一种土著的社会制度的冲突”,前者“在新环境里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却未能取代或同化那里早已形成并与之对立的社会制度”。他对“二元结构”进行了

描述。

阿瑟·刘易斯把“二元结构”与一国经济发展模式联系起来。他首先创立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很低非资本主义部门，以自给农业部门为代表。资本主义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较高，而自给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自给农业部门的收入又决定了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下限。由于人多地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过于丰富，以至于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业产量也不会下降。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部门按照现行工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刘易斯模型的实质就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缩小。也就是说，伴随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将会消除。

“二元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上。在我国，“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2年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电冰箱、彩电数和家用电脑数分别为87.38、126.38、20.63，而农村居民家庭相应的电冰箱、彩电指标分别为14.83、60.45，相应的电脑指标为0；占全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大约只消费了全国消费品的三分之一。在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热水器、照相机、摄像机、计算机的台数分别为97.05、97.23、122、89.14、44.48、9.42、81.88，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照相机、计算机台数分别为62.57、61.54、22.58、4.55、17.96，而热水器、摄像机指标为0。另外，城乡居民每百户年底的摩托车拥有量分别为21.13、60.85，表面看来农村比城市更加富有，其实不然，因为城市居民已经不再是买摩托车，而是买小轿车，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由2002年年底的0.9辆，增加到2011年年底的18.6辆。而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汽车数量几乎为0。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的数字是否准确暂且不提，单从耐用品的质量来说，城乡之间差别很大：城市居民的耐用品常常是叫得响的“牌子货”，质量好、价格高、有好的售后服务；而农村居民购买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杂牌货”，或是就要淘汰的产品，质量没有保证，价格低廉，有一部分甚至是城市居民弃之不用的“破烂货”。这些指标反映了人们物质文化生



活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些指标的差异也就反映了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差异。

从《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 1978 年到 80 年代中期这个差距逐渐缩小，到 1985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3.80%。然后差距开始拉大，1994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4.92%。之后，这种差距有所缩小，1997 年该指标达到 40.50%。可是，之后的每年，这个差距稳步扩大，到 2002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14%，或者说三个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如一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实际上的差距比这个数字还大，而且可能大得多。2002 年 11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中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日前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 3:1，这个差距应该为 5:1，甚至达到 6:1。”邱晓华解释说，去年农民人均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到 40%，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 1 800 多元，平均每月 150 元左右。在这 150 元中，还有 20% 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去年每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 120 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 600 元，城乡差距为 5:1 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 6:1。

从《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 200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2.33 倍，以后虽有减少，但相差还是在 2.1 倍以上。

城乡差别过大也会直接影响农村消费，进而影响工业生产和工业化的进程，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城乡差别过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过大的城乡差别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相抵触，与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不相符合。而且城乡差距过大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会使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更加复杂，影响社会安定。

2

问题提出的主要理论依据

生产力是由五个要素决定的，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与社会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①。在不同时期，决定生产力的这五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②。这要求不同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当今世界已经跨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已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在农村，知识的作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问题没有被充分认识。

3

对中外“二元结构”理论一些观点的述评

1) “二元结构”理论述评

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J·H·伯克 (J. H. Boeke)，他在 1953 年出版的名为《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中，对荷兰政府于 1860 年企图在其属地——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而遭到失败的反思中发现：在一个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别的两种经济形态所组成的社会中，推行单一的经济政策是注定会失败的。在伯克看来，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这种“二元结构”表现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两者之间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部门中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以描述现代部门经济行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来解释传统部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当然是不会奏效的。其原因除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个人效用函数、行为准则以

①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1994 年 7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② 这一理论是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桂斌教授对马克思决定生产力五因素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及工作态度方面的差异外,还由于在非资本主义部门中,资源或生产要素是不能流动的。伯克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对一个非同质的经济社会,采取单一的经济政策是不能奏效的,或者说某一经济政策对于一个经济部门是有效的,对另一个经济部门则可能是无效的。

自从J·H·伯克提出“二元结构”概念后,中外学者开始了对“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其理论主要有:社会“二元结构”论、技术“二元结构”论、经济“二元结构”论(除了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外,还包括“金融‘二元结构’论”和“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论”)、组织或制度“二元结构”论。其中,在“二元结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理论”或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954年,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他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先后写出过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如《经济计划原理》《公摊成本》《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其中《经济增长理论》一书,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1979年,刘易斯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先驱工作,特别是他们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该模型由一个弱小的现代部门和一个强大的传统部门组成,即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是传统农业;资本主义部门是指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用这种使用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些部门。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有差异,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日益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当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达到一致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

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大;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

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第三阶段，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一种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发展道路。

可是，在这些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无论是谁的“二元结构”理论，都忽视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这些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的自身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忽视了影响城乡交流、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城乡居民之间的素质差异对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产活动的重大影响。

在我国，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工作者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提出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但大多数只是“实用”而已，顶多只能缓解燃眉之急，不能够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在这一群体中，林毅夫在“二元结构”理论方面的影响较大。在他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跳出农业看农业”，要用大中城市带动广大的农村。他认为，要想把农民转移出来，转移出来的产业就要有竞争力，能够更多地吸收就业。如果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它就缺乏竞争力，就很难发展。同时，它还必须有一个群聚效应。比如纺织业、电子加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一个厂不会是大而全的，一般只是生产产业其中的一个工序或者是零部件产品。这就需要有配套厂与之相配合。这些配套厂也必须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够把这一产业变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如果是在小城市，这种产业群就很难形成，也就不会有足够大的产业成功。这样的产业，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也不会真正有竞争力。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它远远不能完全解决作为我国“二元结构”现状的主要表现——“三农”问题。这种方法用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践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顶多只能缓解燃眉之急。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既要“跳出农业看农业”，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化人口压力为人口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可是，在我国，农村人



口的素质较低,无法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化人口压力为人口优势的转变。

2)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与“三农”问题的认识与实践

二元经济结构现状的主要表现就是“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就是要消除城乡差别,主要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难点就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就我国学者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而言,经历了一个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对“三农”问题根源的认识上

① 归因于户口制度,并认为取消户口制度就可以消除城乡差别。户口制度毫无疑问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一道屏障,而且扩大了城乡差别,使“三农”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为什么在户口制度逐步取消后的今天,“三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在加深呢?因此,户口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障碍而已,而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② 归因于农民负担。农民负担重是相对而言的,农村居民每年所缴纳的税费与人均纯收入之比远远大于城镇居民的相应指标。但是,就农民负担的绝对数而言,农民每年人均所缴纳的税费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农民负担重只不过是相对于其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的相应指标而言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民所缴纳的税费,而在于农民收入太低。但造成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③ 归因于人才外流,即农村人才流向城市。农村人才流向城市确实使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加重了。但,是什么原因使农村留不住人才?怎样才能使农村能留住人才?而且,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不能解决“三农”问题?人才外流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却不是根本原因。

城乡差别自从城市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城市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往往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自然产生,一些农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等有利因素,使其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农村相比较快,从而慢慢发展为城市;二是人为产生,统治阶级为了其政治原因(如建都设郡)或军事原因等而使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地方迅速。

(2) 在对“三农”问题的归宿上

“三农”问题的归宿,即“三农”问题到底归结于解决什么问题,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应归结为怎样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认为农民收入提高了,“三农”

问题就解决了。提高农民收入当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根本的问题，这也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但农民收入不可能凭空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呢？提高农民收入就是最终目的吗？当然不是！提高农民收入固然重要，但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众所周知：高收入未必有高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高低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方面的；既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又与农民自身的精神状态紧密相连。由于篇幅和精力的限制，在此不作探讨。

此外，在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大声疾呼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有一个异常重要的方面被忽略了：几乎没有人提到农民素质问题，没有把农民收入与农民素质联系起来。而这一点却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显得异常重要：低素质怎么可能导致高收入呢？

（3）在“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法上

在“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我国经济学家提出发展经济、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中城市发展了，就会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从而带动农村的发展，就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到大中城市生活。

林毅夫认为，解决增加农业收入的关键在于：①把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则人均耕种土地增加、农村劳动力会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②转移出来的人，从农业生产者变为农产品需求者，解决收入弹性低的特性。（《入世对农业的影响要具体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2-06-11）

我国其他学者提出了取消户籍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以及用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等合理化建议。毫无疑问，这些建议都是非常好的，都能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建议只是从外部来考虑农民问题，而没有从提高农民素质和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的角度来思考“三农”问题。因此，这些方法顶多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其理论的实质仍然还是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其道路选择，究其实质而言，仍然是数百年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用“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道路。

这些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于从外部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完全忽视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抹杀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如前所述，就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而言，在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上，走的道路实质上仍然是数百年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用